

幾種經學史中的禮學論述

林慶彰^{*}

陳韻教授、主席莊雅州教授、討論人彭林教授、各位貴賓，各位同好：陳韻教授要我來討論這個問題：「經學史中的禮學論述」，她擬這個題目非常好，我本來以為這個題目作起來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，後來我把幾本經學史找來、系統地翻一翻，覺得這是很了不起的題目，我可能不能談得很好，為什麼？因為現在市面上可以看到的經學史，大概有十多種；市面上看不到的，大概也有五、六種，加起來就有二十多種，包括日文的更多了。要把裡面討論「禮學」的文字通通摘錄出來，然後再作批評，是一件很繁重的工作。我為了要完成這個任務，所以就挑幾種比較流行的經學史來討論。

我們都知道晚清的時候，中國方面的經學史論述都還受前人的影響，有點「筆記式」的。像劉師培（1884-1919）的《經學教科書》、皮錫瑞（1850-1908）的《經學歷史》，都不是分「章」、「節」，有「前言」、有「第一章」、「第二章」……，每一「章」下面有「節」，後面有「結論」。要到民國初年，才受到日本的影響。日本最先用這種方式來寫作的就是井上哲次郎（1855-1944）。他寫《日本朱子學派之哲學》、《日本陽明學派之哲學》、《日本古學派之哲學》這三部書，因為井上哲次郎最早到德國去留學，在日本的學者裡面算是最早接觸到西方學術的體例。他的書出版以後，很多日本的學者研究中國學問的，都是以這種方式來寫作。慢慢的中國也受到他的影響，所以，書的結構就符合現代學術的規範。因為這個樣子，我們經學史的體例就變得比較屬於現代化的著作，這是我們應該要注意到的。

如果是這樣來看的話，有不少書不太合這個規範。他還是筆記式的，所以我們就不太選來作為樣本。這裡選的幾種，就像皮錫瑞《經學歷史》，他雖然體例上還有點古舊，但是他有他的見解。再來就是馬宗霍（1897-1976），他的《中國經學史》，也是流傳比較廣的。本田成之（1882-1945）的《中國經學史》，最像井上哲次郎傳下來的書的體例。吳雁南（1929-2001）等著的《中國經學史》，在姜廣輝（1948-）主編的《中國經學思想史》出版之前，比較理想的經學史，應該是吳雁南等著的《中國經學史》。最

^{*}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。

後一本就是姜廣輝主編的《中國經學思想史》，姜廣輝先生，1992 年我邀他跟陳來（1952-）一起到中國文哲所訪問，在之前他是研究「顏（元）李（塏）學派」，他有一本著作《顏李學派》，他看我們作經學，覺得不錯，所以他回去提了一個課題叫「中國經學思想史」，作了十多年終於開花、結果，就是這一套《中國經學思想史》。《中國經學思想史》一般外行的人可能看不太出來他裡面的缺點，但如果真正要去挑他的毛病，那當然很多，因為他是集體創作，可以寫成一篇幾萬字的書評。當然他也有很大的貢獻，他是現在所有經學史裡面討論「禮學」最多的一部書。當然因為它篇幅很多，所以他可以討論的更深入。那我們就以這五本書作為例子，來討論。

「禮學」在中國的發展，是非常的複雜的。恰好彭林（1949-）教授他有一本新的作品，叫作《三禮研究入門》，我們就以《三禮研究入門》前面一小部分討論「歷代禮學的演變」的觀點來看這些經學史，他有沒有討論到這些問題。彭先生的著作把禮學分為七個時段。第一個先秦，先秦就是「從禮制到禮學」這個內容。再來兩漢，他是「三禮之學的成熟」。魏晉南北朝是「鄭王之爭」，「鄭王之爭」應該是魏晉南北朝經學其中的一部分，另外一部分就是「喪服」受到重視。所以《儀禮》的〈喪服〉特別發達。再來隋唐時，《三禮義疏》問世。再來宋元明，「禮學極衰」；清代是「禮學極盛」；近現代是「禮學的復興與轉型」。我怎麼處理這些材料呢？因為有這麼多本經學史，那我先把先秦一直到近現代分成七個階段，按照彭林教授的敘述，我分成七個階段。在這七個階段裡面有談到「禮」的，我就把他錄出來，表示這本經學史有談到某個問題。

在先秦部分。皮錫瑞《經學歷史》有討論《三禮》的作者問題。該書也有談到《三禮》的流傳狀況，各位看第二頁。本田成之的《中國經學史》也有討論到禮學的問題、禮學跟學校教育的關係。姜廣輝主編的《中國經學思想史》也有不少的篇幅討論到禮的問題。他討論到「禮」、「法」的關係。以及禮的道德意義。還有《大學》新解、以及郭店楚簡與《中庸》的關係。這是先秦的部分。

秦漢的部分。本田成之的《中國經學史》，他有討論到《三禮》的作者和內涵。姜廣輝的《中國經學思想史》他討論到「禮類的經傳記」，就是「傳記之學」。我有寫一篇文章：〈傳記之學的形成〉，討論到這個問題。還有討論到《周禮》和古代理想的政治，還有〈鄭玄《三禮注》的思想史意義〉。以上是秦漢的部分。秦漢的部分照道理應該有更多的篇幅來討論禮的問題，因為他是《三禮》的形成的一個重要階段，但是只有本田成之和姜廣輝主編的書有討論到而已。

魏晉南北朝這個時段，可能更讓各位失望，只有本田成之的《中國經學史》有討論到禮的問題。那也就是說彭林教授所討論的，在魏晉南北朝比較值得注意的就是「喪服」的問題。「喪服」受到重視，因為當時重門第，所以「喪服」特別發達。另外

「鄭、王之爭」，這些著作都沒有提到；「鄭、王之爭」在彭教授的書裡，非常重視它。但是有一些觀點，我也另外有意見。一般討論「鄭、王之爭」，都對王肅（195-256）很不以為然，覺得王肅故意跟鄭玄（127-200）搗蛋。這是延續「乾嘉學派」以來的看法。我個人是覺得鄭玄是由今文家轉為古文家，他是個「神權主義者」，所以屬於今文學比較濃厚的學者。所以他引「讖緯」引的很多，就是這個緣故。王肅他是個「人文主義者」，他是純粹的古文家，所以他批判鄭玄，主要在古文的說法。我們只要舉一個例子，就可以得到一些印象。

傳說中周朝的始祖后稷，他出生的來由是他的媽媽姜原踏在巨人的腳跡上，就懷孕了。那個巨人是誰？王肅說是五帝中的顓頊，鄭玄說是上帝。上帝怎麼可以跟姜原生小孩？應該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但是王肅他是用《毛詩詁訓傳》，就是古文家的說法，說巨人就是五帝中的一位。就是顓頊，他是人，所以他可以跟姜原生小孩。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知道王肅是比較站在古學的立場。這個也符合魏晉時代的學風。一般人對魏晉時代的經學都沒有給他一個定位，我們都知道東漢是古學和今文學競爭的時代，有很多人說東漢的古學大盛，那是不對的。因為東漢時代所刻的石經，「熹平石經」都是今文經，都是今文經怎麼能算是古學大盛呢？古學要到魏的時候才受到肯定。所以「三體石經」裡面有古文。其他像杜預（222-284）、或者何晏（190-249），他們都是屬於古學派的學者。所以王肅那個時候跟鄭玄爭，主要就是在純古學和今文相互的鬥爭。關於這一點，我的想法是這個樣子。

另外，我們看隋唐時代，說是「經學統一的時代」，皮錫瑞在這裡引用朱熹（1130-1200）的說法。朱熹說《十三經注疏》中，《周禮》最好，再來《禮記》其次，《尚書》和《周易》是比較差的。皮錫瑞在這裡就發揮這一點，認為朱熹的說法是很正確的。我們知道經學統一的時代是指孔穎達（574-648）作《五經正義》。《五經正義》大體上都是抄襲南北朝學者的著作，我們現在只要看《禮記正義》，就是抄皇侃（488-545）的《禮記義疏》。現藏在早稻田大學的《禮記子本疏義》，鄭灼的書，就可以知道孔穎達的《禮記正義》是完完整整抄了皇侃的《禮記義疏》。這個照道理應該是要提出來討論的，但是所有的經學史的著作都沒有討論到這個問題，這是很可惜的事情。

再來「經學變古的時代」，這裡照道理要討論到朱熹的《儀禮經傳通解》。本來《儀禮》被王安石（1021-1086）廢掉了，到了朱熹的時候把它恢復過來。因為《儀禮》被廢掉了，所以當時刻《十三經注疏》，就沒有刻賈公彥（?-?）的《儀禮注疏》，沒有把它收進去。到了明朝時李元陽（1497-1580）刻《十三經注疏》才把它放進去。這個對《十三經注疏》的形成也是很重，這些經學史的著作都沒有討論到這個問題。

到了清代，像皮錫瑞的書有討論到三禮館的《周官義疏》、《儀禮義疏》、還有

《禮記義疏》，這可以說是比較完整的論述。其他的經學史的著作，對清朝的禮學復興都沒有討論，這是相當遺憾的事情。

綜合剛才的論述，大體上經學史中討論禮學，大概以姜廣輝著作的篇幅最多，其他的篇幅都不夠多。本田成之的著作算是比較平均的。但是如果以彭林先生的七個時段來說的話，現在經學史都無法反映禮學發展的實況。這是我們要提出來，對現有的經學史作批判的。就是把現有的經學史拆散，拆散成「易學史」、「書學史」、「詩學史」、「三禮學史」、「三傳學史」……這樣就可以看出哪一本經學史的論述，比較首尾完整的。也就是說，你合起來是一本經學史，拆開的時候是《十三經》的「單經史」。如果能夠作到這個地步的話，這部經學史才算是好的經學史。我們現在要衡量一部經學史的好壞，應該從這個角度去看。我這裡還要提出來的，就是因為現有的經學史對禮學的論述都太少了，彭林、葉國良教授是禮學大家，應該寫一本更詳細的《三禮研究史》，可以補現有經學史的不足。我的討論就到這裡，謝謝各位。